

环保精准化 避免“一刀切”

随着北方地区进入取暖季,大气污染防治再次迎来考验。如何科学施策、精准治理,以实际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关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也关乎民生福祉。

前不久,河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制度,引发关注。该制度对纳入清单的企业、项目,优先保障其生产经营活动,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期间“不停产、不限产、不检查、不打扰”;跻身正面清单的关键,在于能否做到达标排放、自律减排、污染治理水平领先。目前,经过逐一现场核查评估及多部门会商,河北共有1640个项目、企业被纳

入首批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

现实中,一些地方或部门平常不作为,不担当,到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强化监督、年终考核开展的时候就临时抱佛脚,采取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停工停产停业等简单粗暴的做法。少数地方曾经出现的无差别“一刀切”,损害了合法合规企业的权益,也折射出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如今,河北等地纷纷制定实施严格禁止环保“一刀切”的政策措施,通过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制度、“一企一策”差异化应急减排等做法,对各类企业分类施策、“扬善惩恶”,推动环境管理模式从“底线约束”向

“底线约束”与“先进带动”并重转变,有利于更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蓝天保卫战。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生产模式。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由于重视程度、管理水平、治污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污染治理水平和效果可能大不相同。在环境监管中,如果不能有效体现鼓励先进、奖优罚劣、区别对待,就容易导致“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例如,如果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期间,投入巨资安装并正常运行治污设施的先进企业,也必须和落后的散乱污企业一样“一律先停再说”,就会让严格守法者付出高成本,进而影响先进企业

的效益和治污积极性。实施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制度等举措,将领跑者和落后者明明白白区分出来,有助于加强生态环境差异化管控,激发企业治污减排的内生动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但依然任重道远。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更加注重精准施策,我们就能以良药治愈沉疴,让蓝天白云越来越多,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毅)

马上评论

近日,有媒体做了一项针对大学生逃课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被调查的77名大学生中竟有66人有过逃课的经历,如此“高频”的高校大学生逃课现象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什么导致学生们逃课?他们逃课后又去干什么?

高校大学生逃课现象频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机制上的矛盾问题,也有学生、教师、课程、学校、社会等多方因素,很难笼统地“一言以蔽之”。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青年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只有青年一代有远大理想、有过硬本领、勇于担当,我们的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学

刹住高校逃课风须多方发力

生逃课现象也不例外。我国高等教育经历数次“扩招”后,高校的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现了大学梦,但部分高校的管理没有同步调整,无法承载急速扩张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曾经在世人眼中的“象牙塔”如今已不再那么光鲜了,以往“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也没有了什么神圣感了。不再珍惜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大学生逃课现象背后的肇因之一。

从学生自身来说,身处大学校园的他们应珍惜学习知识、充实自己的大好时光,正处花样年华的他们可谓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然而并非每一位大学生都能将普通大学生

的生活上升到时代担当和责任使命这么高的层面,也并非每一个大学生都会通过个人的不懈付出而尽可能地把自已的大学生活过得充实。不少大学生该上课时不上课,是缺乏自律的表现。

如上所述,面对当前高校大学生逃课现象,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仅靠一纸规定就简单了事,而是需要综合应对,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教师和学校的主观作用,更多地以“金课”来满足学生的学习之需,尽可能地把学生吸引到课堂上来;另一方面,家庭、社会应该主动介入,营造适宜大学生学习成长的良好氛围,减少逃课现象的发生。

(张凡)

观察 南北

利用名贵特产谋利成为查处整治重点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利问题的阶段性成效:全国共查处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2848个,处理4217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749人,给予党纪处分2009人、政务处分1161人,组织处理449人,诫勉307人,通报曝光典型问题856个,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制定了规范管理的制度规定。

何谓“名贵特产、特殊资源”?通报中的一些具体案例说得很详细。如贵州、四川、山西等白酒大省,不少被查处的案例就与“高档酒”“定制酒”有关;在新疆,相关集中整治主要涉及和田玉等名贵特产、特殊资源;青海对应的则是冬虫夏草和昆仑玉及其制品;而银保监会就是重点整治公职人员收受纪念币(钞)等特殊资源。

从各地查处的案例看,此领域内的违纪违法现象,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部分特殊资源被作为利益输送的媒介和公款消费的对象。如不少落马官员的受贿清单中往往都有价值不菲的名贵特产,一些官员还由此养成了种种“雅好”,部分人对金银玉石情有独钟,个别官员甚至被曝“只喝年份茅台”,还有官员因“天价烟”而现原形。

二是,名贵特产、特殊资源的监管、审批,也往往成为权力违规干预、寻租的突出领域。典型者如贵州查处党政领导干部、国企管理人员以茅台酒谋取私利的问题就达167起,处理180人。

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私,对应的实质就是“特权”,不管具体发生在哪个环节,都是对党纪国法的违背,既突破权力运行底线,败坏政府形象,也伤及正常市场生态,必须“零容忍”。

结合相关违纪违法案例的现实,下一步的整治或可侧重两个方面。首先,公职人员“消费”、收受名贵特产,一般容易外露,可加大相关线索的追查并鼓励社会和舆论监督;其次,一些名贵特产、特殊资源的重要产地应加大重点整治,但并不意味其他地方、行业可以放松,相关治理就该全国一盘棋,在违规“插手”和违规收受上,都应实现“零容忍”。

(新京)

快递价格战不能减损收件人利益

快递价格战每年都会打,2019年异常激烈。据报道,快递派件价钱基本是固定的,一名快递员如果要多赚钱还要多收件,快递间打价格战不是什么新鲜事。想揽客户,价格上就要有优惠。

当快递揽件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只会通过控制成本要空间,很有可能牺牲服务的安全性、周到便利性的品质,导致快递服务始终无法走出低价低质恶性循环,如投递上门得不到保证,快件损毁纠纷得不到有效处理等等。此外,如果长期低价策略成为企业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以谋求垄断地位,最终具有

了价格主导权,则又可能出现服务价格垄断的局面。

更关键的是,快递价格战有其特殊性。快递服务的主要对象是电商,这在于快递服务是电子商务的跟进与配套,价格竞争证明其对电商的深度依赖,其价格战受益的永远是电商,末端的消费者的服务与权益则可能成为价格博弈的牺牲品。在揽件定价方面,电商与快递企业的协议价格要远低于零散用户的执行标准,在快件量的峰值如“双11”、春节等时段,快递行业内部还出现联手涨价,大幅度提升揽件资费标准的奇怪现象。

对于快递的价格竞争,既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同时也需要来自政府和行业监管的有形之手,引导建立快递揽件价格成熟的市场定价机制。一方面,应鼓励行业内部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让利于末端网点,减轻网点的运营压力,如与实际揽件价格收费挂钩的费用收取机制。另一方面,应引导以行业之间价格谈判形成价格,取代单方定价或者点对点议价的方式,比如由区域的快递行业协会与电商协会定期召开会议,谈判形成区域内的收件价格标准,形成合作的共同遵循。同时,还要建立起防止低价竞争的自律机制。(木须虫)

一家之言

11月24日,国家医保局在山东济南举行全国医保电子凭证首发仪式,启动全国医保电子凭证系统,签发全国首张医保电子凭证。其中,山东省济南、青岛、淄博、烟台等城市和9个省本级统筹区为医保电子凭证和移动支付工作试点地区。医保电子凭证可以实现就医买药不刷卡、在医院挂号取药、在药店凭医保码付款等功能,患者看病时可带手机凭码轻松支付,没带手机可“刷脸”。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医疗机构仍然使用纸质医疗票据,医疗票据电子化的呼声很高,此前浙江等地推出医疗电子票据时,曾

医保电子凭证让看病报销不再“堵”

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医疗票据电子化之后,不仅避免了患者开票或因票据遗失带来的麻烦,而且还能减少纸张消费,可谓既环保又便民。

目前医院就诊卡各不相同,尽管不少城市都统一了就诊卡,但问题是,既有全市统一的就诊卡,医院自己发行的就诊卡又不取消,这样一来反而出现一家医院存在多种就诊卡的现象。去年12月2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健康卡。很多人期待在全国电子健康卡尽快普

及的同时,那些过时的就诊卡也应该取消。此次国家医保局推出的全国首张医保电子凭证,集医疗票据、医保卡、就诊卡的功能于一身,并且实现了电子化。假如这种凭证能够得到普及,那么,看病报销就不再堵点,患者“一卡行天下”将变成现实,就可以便捷就医享受医保福利。

医疗信息化需要统一标准,应该注重顶层设计,国家医保局推出的全国医保电子凭证,值得寄予积极期待,但各地医院如何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统一步伐、少走弯路,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秋实)

精准遏制高仿APP,保护公众上网安全

据媒体近日报道,为方便打理财务,山东济南市民韩先生下载了一款名为“xx银行信用卡”的APP,不久后却发现银行卡被盗刷、莫名被贷款等情况。到银行营业网点核实,被告知所安装的客户端是高仿的。

盗版、山寨APP乱象,早已不是第一次被媒体曝光,其泛滥程度可能也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严重。早在2015年,就有相关调查报告显示,某个手机应用系统中,平均每款正版APP对应92.7个盗版,特别是工具类软件以及模拟辅助类游戏最易遭仿冒。从此次媒体的调查看,这一乱象显然仍未得到

有效的遏制。

针对高仿APP难治的原因,有专家分析称,目前在打击高仿APP的过程中,存在多方协调难、举报下架过程漫长、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因素,给一些不法企业从事违规行为提供了空间。但此事真要解决起来,未必那么难,关键还是要抓住“牛鼻子”。每款APP上架应用商店,都需要经过事先的审核,如果应用商店能根据用户举报及时予以下架,或者增加审核的精确性,在前端就对山寨APP关上大门,这一问题必定会得到有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说,李鬼式APP

恐怕不是治不了,而是愿不愿治的问题。

移动互联网时代,像李鬼式APP、存在安全隐患的链接以及种种灰色广告,这些不仅关乎人们上网的体验感,更关系到个人实实在在的权益风险。对此,就应该像线下保护消费者权益一样,维护公众上网“安全感”。相较于线下的权益保护,网络权益保护是可以把前端的技术关口来加以有效控制的,这需要网络服务运营商的自觉和相应的技术投入,也更依赖网络服务监管的与时俱进。

(华闻)